

第一章 中国古代海军的诞生

我们伟大的祖国屹立在亚洲的东部，濒临烟波浩淼的太平洋，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在内陆，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这些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舟楫和灌溉之利，也给海军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数千年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和捕鱼工具的舟楫，逐渐应用于军事目的。先是运送军队和军事物资，后来又在江河湖海作战。水上作战，开始只是偶然的。后来人们逐渐自觉地把用于水上作战的船只武装起来，人员组织起来，于是中国古代海军出现了。

第一节 舟楫的出现

我国舟楫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在远古年代就出现了木筏，7000多年前产生了独木舟，3000多年前又制成了木板船。木板船的问世，是船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上古年代，我们的祖先通过长期的生产劳动和同洪水作斗争的经验，产生了“木在水上”的概念，（水能浮起木头，见《易经·系辞》）进而懂得“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骑着木头可以过河，见《易经》）后来又发现把几根木头捆扎在一起，比单根木头浮力大，稳性好，于是木筏便出现了。据《物原》所说，一个叫伏羲的传说人物，学乘过木筏（“伏羲氏始乘桴”）

筏是上古先民水上运载的工具。但筏没有干舷，不具备容器的形



图 1 武进出土的独木舟



图 2 河姆渡出土的船桨



图 3 商代甲骨文的“舟”字

态，还不能算作舟、船。只有在独木舟问世以后，在人类文明史上才出现了舟船的雏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我们的祖先又用火烧和石斧砍挖，把一段大树干挖空，制造出了独木舟，同时用石斧砍削，制成了桨。这就是《易经·系辞》所说的“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这一记载，为后来出土的文物所证实。1958年，在江苏武进县出土一只长 11 米，宽 0.9 米的独木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遗物（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1978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柄船桨，长 51 厘米，宽 15 厘米，厚 1.2 厘米。经科学鉴定，其年代为公元前 5000 年。

到了商代（约公元前 16 至公元前 11 世纪），出现了木板船。这是由于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提高，制造出了能剖制木板的铜斧、铜锯和铜凿。

商代甲骨文的“舟”字，很像一只木板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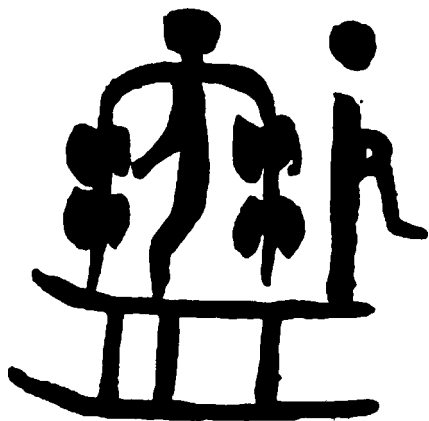


图4 饗饗铜鼎的“荡”字

木板船在船体结构方面，已注意到了船体的对称和平衡，即船的稳性。有了这样的船，我们的祖先便能够比较自由地从事水上运输了。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饗饗铜鼎上的“荡”字，好像一个挑着贝币的人站在舟上，后面还有一人划桨，这说明当时已用木板船进行水上运输了。

最简单的木板船要算是“三板船”。在我国湖南、云南、广西有些狭窄滩多、河道弯曲的地方，至今还可以看到它的踪影。全船由3块板构成：2块侧板、1块底板。底小面大中部宽，两头梢并向上翘起，线条流畅，形体优美。从独木舟演变到木板船，是造船史上的一次飞跃，标志着人类不再受自然界所提供的原始材料的限制，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再创造，制造出适合各种用途（其中包括军事用途）的船只。这就为后世船舶的大型化和多样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为舟师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图5 湖南的木板船

第二节 舟师的形成

我国古代海军称舟师、水军或水师，它是随着战争的需要和战场的转移而逐步形成的。大体上经历了追捕奴隶、军事运输和有组织地进行水上作战的三个发展阶段。人类社会自从出现阶级和阶级战争之后，船舶逐渐由运输和捕鱼工具，发展成为一种暴力工具。据殷商甲骨卜辞记载，商代后期，商王武丁曾派人乘船追捕逃亡海上的奴隶，用了15天时间把这批奴隶捕捉回来。（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后来，随着船舶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船舶便大规模地用于战争了。

最初，船舶只是被征调运送部队和军事物资。武王伐纣渡孟津，是我国史籍关于船舶用于军事运输的最早记载。公元前1070年正月

(另一说为公元前 1066 年,见唐志拔:《中国舰船史》等)周武王率兵车 300 乘,虎贲(周王的近卫军) 3000 人,甲士 45000 人,并联合了一些方国部落的军队,大举伐纣。参战部队由 47 艘大船运送,在孟津渡河东进,经牧野决战大破商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灭亡了商朝。这次渡河作战,组织严密,有专人指挥船只,规模空前。但这些船只毕竟是临时征集的,没有专门用于水战的兵器和人员,因此还称不上舟师。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器的使用,造船技术和造船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临江傍海的诸侯国都出现了造船业,其中以吴、越最为发达,称之为“船宫”,能造多种用途的船只。南方各国江河密布,水上运输也很兴盛,吴国“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至于越国,还在周代,就有“于越献舟”的盛事,浩浩荡荡的船队沿海北上,入淮河西行,到达今天西安附近周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所有这一切,为中国古代海军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力量日渐强大,出现了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局面。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先是在中原地区进行,后来扩展到东南地区。为了适应水网地区作战的需要,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和面临东海的齐国,都先后改装和建造战船,抽调官兵进行水上作战训练。于是,中国古代海军便应运而生了。

我国古代海军诞生于何时何地,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根据史料推算出来。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这是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水战记载。这次水战发生在鲁襄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 549 年。这就是说,在公元前 549 年以前,楚国就已经有了舟师。据元代的马端临考证,“楚用舟师自康王始。”《文献通考·兵一注》按楚康王元年,正当鲁襄公十四年,即公元前 559 年。可见我国古代舟师在鲁襄公十四年至二十四年,即公元前 559 年至 549 年之间就已诞生,距今至少已有 2550 多年的悠久历史了。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造船和航运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逐步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铁器的使用，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铁制的斧、凿、锯等木工工具，测垂直的悬锤和测平面的简单水平仪都已出现，木工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能将曲木压直，直木压弯）。我国古代杰出的工程师公输班（鲁国人，故又称鲁班）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改进了生产工具，对造船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开始出现了用途不同，形状各异的船舶。

当时，民间有快速的轻舟、扁舟；有适用于短途运输的舡船，有运输粮食的槽船，有供国君乘坐的“余皇”，还出现了专门用于水上作战的战船。

春秋时期的内河航运相当发达，“泛舟之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秦国赈济晋国的几万斛粮食“自雍及绛相继”。雍是秦国的都城，在今陕西凤翔县，临渭水。绛是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省绛县，傍汾水。运粮船由雍至绛，先沿渭水东下入黄河，然后逆流北上，东折入汾水。航程六七百里，首尾相继，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长江的航运更为兴盛。据《史记·张仪传》记载张仪游说楚怀王时说：“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舡船载卒，一舡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在楚的西界。”

1958年，在安徽寿县出土了战国时期楚怀王赐给鄂地一个名叫启的封君的行路符节，叫“鄂君启金节”。节文规定，鄂君持有此节，可以集3艘船为1批，以50批即150艘为限，自武昌出发，在长江、汉水、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和赣江航行，以达汉口、南昌、沙市等处，可免税通行，并可得到食宿优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楚国已经设立了水路驿站，可见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舟船往来之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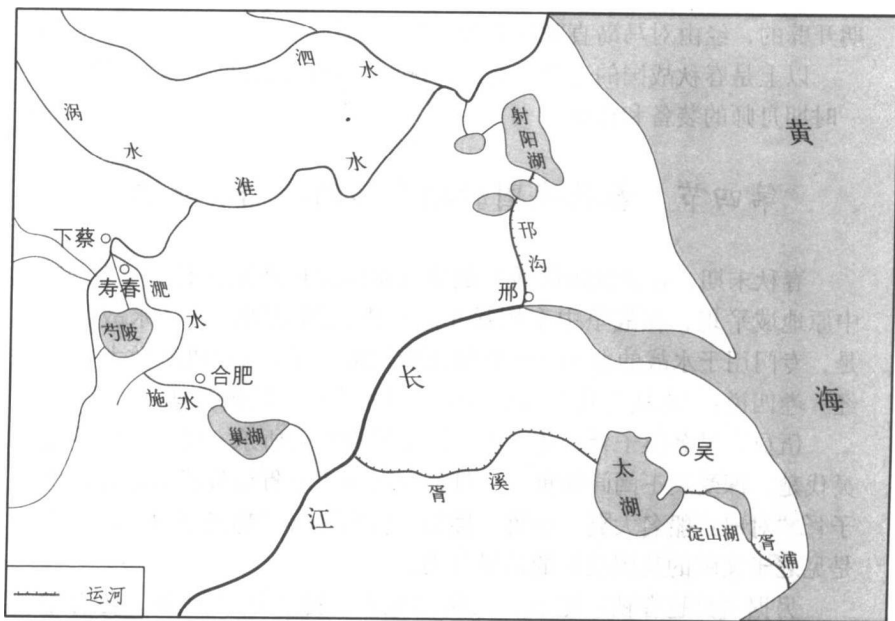


图6 胥溪、邗沟路线图

公元前 506 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开凿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条运河——胥河。胥河又称胥溪，它从苏州通太湖，经宜兴，高淳，穿石臼湖，在芜湖注入长江，全长 100 多公里，从而缩短了从苏州到安徽巢湖一带的路程。在胥溪开成的当年，吴王阖闾就率军从胥溪伐楚，取得了胜利。阖闾死后，夫差又派人开凿了江都到淮安长达 185 公里的邗沟。公元前 484 年，吴国军队从这条水路进攻齐国，又取得胜利。连续两次胜利，使夫差更加相信利用水路进军的价值，于是又深挖了泗水和济水之间的菏水。这样一来，吴国军队从苏州乘船出发，从邗沟进入淮河，再从淮河进入泗水，然后通过菏水进入济水，就可以直达中原腹地，与中原诸侯国争霸了。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海上交通，据学者们的考证，中国通往日本的航线这时已有两条：一条为春秋时期

所开辟，是一条借日本左旋环流漂流的单向航线；另一条则是战国时期开辟的，经由对马岛直驶日本北九州。

以上是春秋战国的造船和航运概况，了解它，有助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舟师的装备和作战。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舟师的战船和兵器

春秋末期，各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从中原地区逐渐转移到了江南。中原地域平坦，在战争中多用兵车。江南江河交错，宜于水战。于是，专门用于水战的船舶——战船便应运而生了。《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说：“水战之具，始于伍员，以舟为车，以楫为马。”

伍员，又名伍子胥，楚国人，因父兄为平王所杀，投奔吴国，佐吴伐楚，深受吴王阖闾倚重。一日，阖闾向伍子胥请教船军之备，伍子胥“对曰：船名大翼、小翼、楼船、桥船”（《越绝书·札记》）这是见之于文献的我国战船的最早分类。

另据《吴越春秋》记载，吴国的战船，除上述几种外，还有中翼。大翼、中翼和小翼合称“三翼”。

大翼“广一丈五尺二寸（以当时每尺约合0.23米换算，约3.5米），长十丈（23米），容战士二十六人，櫂（桨手）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人，吏僕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越绝书·札记》）船上配备的兵器有长钩、长矛、长斧各4把，弩32把，箭矢3200支，头盔32顶。（参见《中国舰船史》）这种战船船身狭长，桨手多，因而速度快。从船的尺寸和人数来看，大翼可能有两层，下层为桨手和操船水手工作的场所，上层是士兵作战的地方。

中翼“广一丈三尺五（3.1米），长九丈六（22米）”。

小翼“广一丈二尺（2.8米），长九丈20.7米”。

这三种船船体狭长，速度快，适宜于在长江中下游活动。

突冒船首装有坚硬而突出冲角，船体结构坚固。《尔雅》中记载，“冒突取其触冒而唐突也”。冒突即突冒，意思是说这种船是因有冲

角，能冲击敌人而得名的。

楼船“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越绝书》）意思是说楼船相当于陆军作战用的楼车。所谓楼车，据《通典》的解释，是“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轳，以绳挽板，屋止竿首，以窥城中”。《梁书·侯景传》说，“设百尺楼车，钩城堞尽落，城遂陷”。由此可见，楼车是在车上设十余丈高架，推临城边，既可了望又可攻城的一种战车。与楼车相当的楼船，也是在船上设高架，可在上面发矢石，居高临下地攻击敌人。这种楼船由于形体高大，还可在水上阻挡敌人的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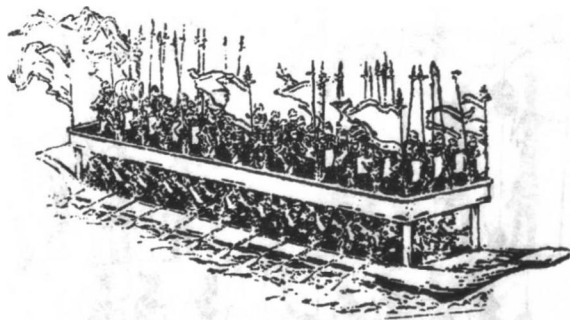


图7 大翼船

桥船据《越绝书·札记》记载，伍子胥把这种船解释为相当于“陵军之轻足骠骑”。可见桥船是一种体积小，速度快，机动性好的轻捷战船，可用于冲锋陷阵。

此外，吴国还有一种专供君王乘坐的“王舟”，称为“余皇”，是水战中的指挥船。

越国舟师的实力不亚于吴国，战船的种类不少，但见于文献的只有戈船。据《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68年，越王勾践自会稽（今浙江绍兴）迁都时，曾用“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什么是戈船？一种认为“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另一种则认为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文献通考·兵

志》)看来后者比较可信,戈船可能是载执戈之士的战船,用于与敌人短兵格斗。

齐国的战船,无从查考。据《北堂书钞》卷一三七记载,秦国有太白船,晋国有飞云船、仓隼船、金船、小儿、先登、飞鸟等战船。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春秋时期在建造战船时 已注意到了速度、机动性和战斗力,注意到了按作战任务和作战水域配套发展战船,既能在水战中各自发挥其性能特点 又能取长补短 形成整体战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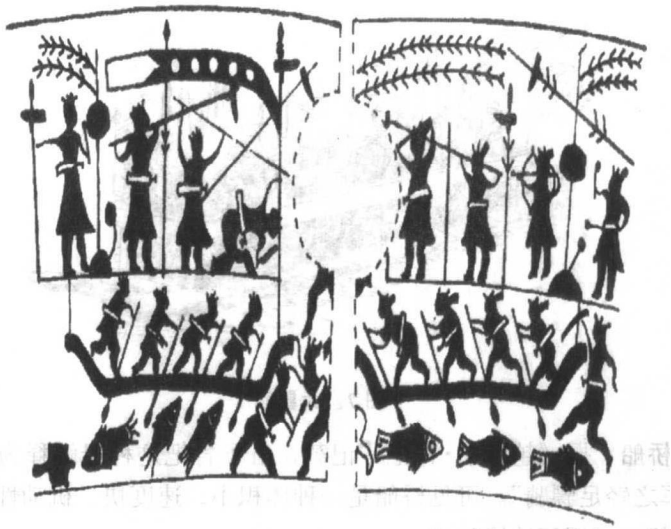


图 8 山彪镇出土的战国铜鉴上的水战纹图案

春秋时期舟师所使用的兵器,除与陆师通用的刀、剑、弓、矛之外,还有专用的,如长钩矛、长斧之类。据《墨子》记载,公输班帮助楚国“为舟战之具,谓之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这种兵器的形状不详,可能是一根带金属钩刀的长竿。古代水战主要是接舷战和撞击战。敌船进攻时,用钩拒拒之,使之无法接近;敌船退却时,则用钩拒钩住 不 让 其 逃 脱。真 是 匠 心 独 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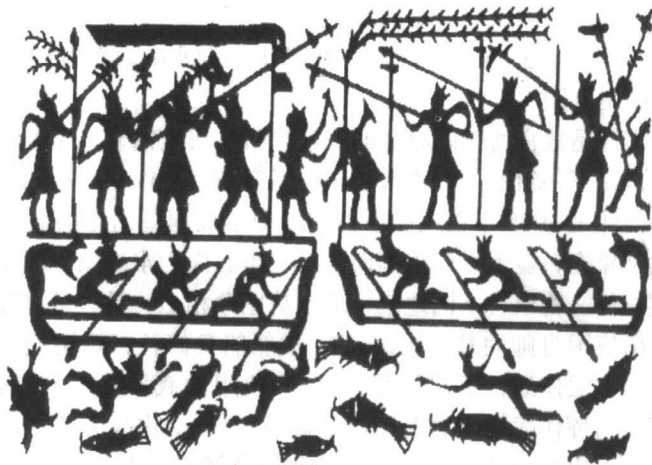


图9 晏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上的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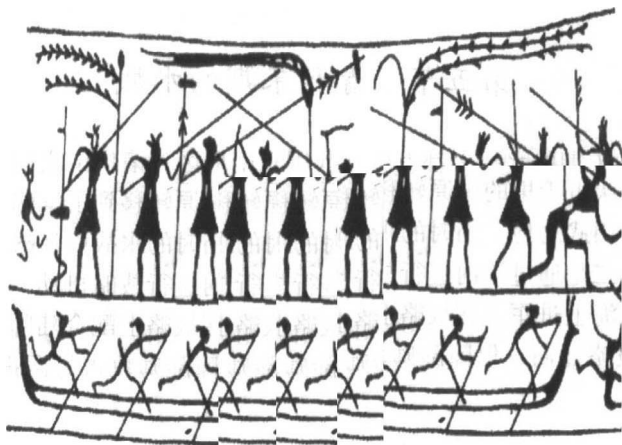


图10 嵌错燕射水陆攻战画像壶纹饰展开图

战国时期的战船和水战，史籍没有多少记载，但从战国墓出土的三件铜器上却得到生动可靠的反映。

第一件是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面有水战图案（图8）。

第二件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晏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壶上的图纹共分三组，最下一组的左方是水战图。图案与第一件基本相同（图9）。

第三件是1965年在成都市百花潭中学战国墓出土的嵌错燕射水陆攻战画象壶，壶上有四组画面，第三组右面为水战图（图10）。

这三件文物出自不同地区，但水战图象相似，具有可靠性，从中可以看出战国舟师的基本情况：1. 战船船身修长，船尾翘起，分上下两层，上层作战，下层划桨；2. 所使用的武器为弓矢、长钩矛、长斧等，指挥作战的工具具有旌旗、楹鼓等；3. 作战方式主要是接舷战。从湖南出土的战国郢于顶盘形刻纹和浙江鄞县甲村石秃山1972年出土的战国铜钺刻纹中，我们还可见到帆和舵。

舟师战船的发展、装备的改善给水上作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五节 春秋末期的水战

春秋末期的水战大都发生在我国东南地区各诸侯国之间。这是因为当时诸侯的争霸战争，已由沃野千里的中原转移到了滨临大海、江河交错的东南地区，舟师大有用武之地。当时的水战以江战居多，一是为了争夺对长江的控制权，二是通过江河进行战略机动。海上行动也有两次：一次是吴越舟师从海上进军，在战略上配合陆师攻齐；另一次是越国舟师从海上进行战略迂回，保障陆师攻占吴国都城姑苏。下面介绍几次主要水战。

一、吴楚水战

春秋时期，楚国的疆域西北到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建都于

郢（今湖北江陵）。吴国拥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分和安徽、浙江一部分地区，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楚吴共有长江，世为仇敌，经常相互征伐。有人据史籍统计，吴楚之战达 18 次。但《吴越春秋》卷二注则记为 20 余次。其中可以查考的水战，有以下几次。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549 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赏罚不明，无功而还”。这是我国古籍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水战。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 525 年），吴国起舟师伐楚，这是吴楚第二次水战。据《左传》记载：吴伐楚，……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博望山江岸），……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吴公子光请于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籍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适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

七年之后，即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518 年），楚国在越国的支持下，又“为舟师以略吴疆”。（《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八）结果不仅中途无功而还，而且楚的属国“巢”（安徽六安东北）和“踵离”（今凤阳东北）反而为吴国吞灭，丧师失地。从此，楚国国势一蹶不振，接连又有几次水战失败。据《文献通考·兵一》注，昭王时，救潜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河内而返，竟无成功。囊互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逐败楚师。入郢之后，吴太子终累又败楚舟师，获其帅……

鲁定公四年（公元前 506 年），吴国与蔡国（今河南新蔡）、唐国（今湖北随州西北）结盟，联合攻楚。这年冬天，吴王阖闾率其弟夫概及伍子胥、伯嚭、孙武等谋臣武将，发兵 3 万，乘船由胥溪入淮河西进，在淮汭（今河南潢川西北）舍舟登陆。然后以 3500 名精锐士卒为前锋，在蔡、唐军的引导下，越过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的三大隘口——大隧（今河南信阳南与湖北交界处）、直辕（今河南信阳南）、冥阨（今河南信阳西南与湖北应山县交界处），直向汉水东岸挺进。楚国派令尹子常、司马沈尹戌、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率军在汉水

西岸抵御，与吴军隔水对阵。

楚军按照沈尹戌的建议，由子常坚守汉水西岸，正面阻击吴军；沈尹戌率军迂回至吴军侧后，毁吴舟，塞三关，断其归路，然后前后夹击。但子常听信了黑“吴用木（舟师）也，我用革（战车）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的意见（《左传·定公四年》）又想独占功劳，擅自改变原定计划，单独率主力渡汉水列阵。吴军鉴于楚军势盛，为免遭前后夹击，即由汉水东岸后退。子常企图速胜紧追吴军，在小别（山名，在今湖北汉川东南）至大别（今大别山）间，三战不利，锐气受挫。

十一月十九日，吴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迎战楚军。夫概认为子常不得人心，军无死战之志，即率部 5000 人先发起进攻，楚军一触即溃，阖闾及时投入主力，扩大战果，大破楚军。子常逃奔郑国，史皇战死。楚军遭重创后，向西溃逃。吴军乘胜追击，在清发水（今湖北涡水），用夫概“半渡而击”的计谋，再歼楚军一部。吴军继续追击，在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再败楚军，于二十九日占领了楚都郢城。

这次吴国进攻楚国，先水路后陆路，横跨今天的苏、皖、豫、鄂四省，实施远程战略机动，这在春秋时期是罕见的。在这次作战中，舟师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因此，《文献通考》、《古今图书集成》都把这次作战列入舟师水战，是很有道理的。

二、吴齐海战

春秋时的齐国位于今山东东北部，其疆域东到海，西到黄河，南到泰山，北到无棣水（今河北盐山南）。齐国本是一个霸主国，到了春秋末期，国势逐渐衰败。鲁哀公元年（公元前 494 年），吴王夫差战胜越国以后，一心要北进争霸。夫差为准备“伐齐南鄙”，开凿了邗沟，以便从水上进军。鲁哀公十年（公元前 485 年）吴国会合鲁等三国军队攻打齐国。吴王夫差亲率主力由邗沟入淮水北上，直抵齐国南部边界。另派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左传·哀公二》）在黄海与齐国舟师进行了一场海战，战败返航。这是我国史书

记载的第一次海战，也是第一次海陆协同作战。第二年，吴鲁再次联军伐齐，艾陵（今山东泰安附近）一战，齐军大败，鲁、卫、宋诸国都归顺吴国，吴国势更加强盛。

三、吴越水战

春秋末期，先后崛起于长江下游的吴、越两个诸侯国，进行了反复的争霸战争。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 494 年），越被吴战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伺机灭吴。吴王夫差胜越之后，因胜而骄，穷兵黩武，急于以武力威胁齐、晋，称霸中原，放松了对越国的戒备。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 482 年）春，夫差率吴国精锐部队北上黄池会盟。勾践乘吴国后方空虚，“乃发习流（水兵）二千人，教士（经过训练的士卒）四万人，君子（越王的警卫部队）六千人，诸御（在职军官）千人伐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范蠡等领舟师沿海派（溯）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在邗沟和长江上夺取了大量吴军运粮草的舟船；一路由大夫畴无余、讴阳为先锋，勾践自率主力继后，从陆路北上，攻入吴国都城姑苏，歼敌万人，吴太子友被杀，夫差被迫求和。是役，越国舟师进行了千余公里的远程战略迂回，保障了主力袭击成功。

夫差向越求和后，双方息兵四年。在此期间，楚军舟师在尹子西指挥下来袭吴，吴军舟师战败。

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 478 年），越国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乘吴国大旱之机，向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三月，勾践进军到笠泽（江名，今苏州南，自太湖东至海，南与吴淞江平行）。夫差也率领姑苏所有的部队迎战。越军在江南，吴军在江北，双方隔水对阵。勾践在主力两翼派出部分部队，为左、右句卒（句卒亦作勾卒，句音勾。见《左传·哀公十七年》）。黄昏时，命左、右句卒分别荫蔽在江边；半夜时，鸣鼓呐喊，进行江上佯攻。夫差误以为越军分两路渡江，连夜分兵阻击。勾践乘机率主力荫蔽渡江，出其不意地从吴军两路中间的薄弱部位展开进攻。吴军败退。越军乘胜猛追，再战于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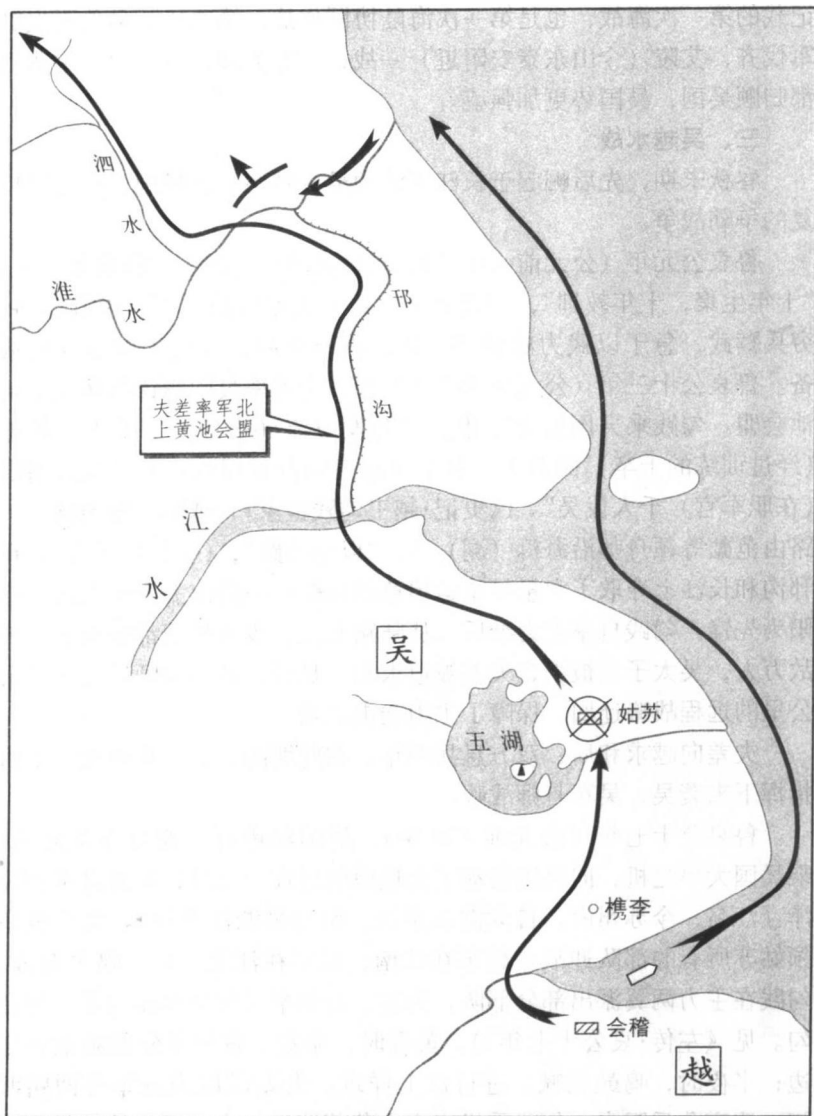


图 11 越军袭击姑苏示意图

（今苏州南），三战于郊（今苏州郊区）。越军三战皆捷，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周元王元年（公元前 475 年），越军在长期围困姑苏之后，发起总攻，灭亡了吴国。

越吴笠泽之战在战术上的主要特点，是夜间潜渡，荫蔽突然，乘虚捣隙。为此，既要在江上两路佯攻，以调动敌人，又要运送主力荫蔽渡江，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的舟师，显然是不可能的。有人在谈到舟师在此战中的作用时说：“笠泽之战，越以三军潜涉，盖以舟师胜。”（徐天佑注《吴越春秋》）这样的评价是恰当的。